



纪念版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唐长孺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长孺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

ISBN 978-7-100-15269-3

I. ①魏… II. ①唐… III. ①中国历史—魏晋
南北朝时代—文集 IV. ①K23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9164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本书据中华书局2009年版排印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唐长孺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269-3

2017年12月第1版

开本710×1000 1/16

201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29

定价:142.00元



唐长孺
(1911—1994)

丁卯除夕偶賦

鼓音為羽百車！
塵更無寸力應
時需乾坤一
次第開新貌曰
月渡綿到歲除
庶庶至聖人
散後江城爆竹
夢迴而高聲
十七年事乞
回，去叢
川露
通

作者手迹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

出版说明

商务印书馆自 1897 年始创,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于建馆翌年便出版了《马氏文通》,这部学术经典既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百年学术出版的序幕。

其后,商务印书馆一直与中华现代学术相伴而行,出版了大批具有鲜明原创精神并富于学术建树的经典著作,诸多开山之著、奠基之作都是在本馆首次问世。这些学术经典的出版,使本馆得以引领现代学术发展,激动社会思想潮流,参与民族新文化的构筑,也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荣光。

1949 年以后,本馆虽以译译世界学术名著、编纂中外辞书为侧重,但原创学术著作的出版从未止步。2009 年起,我馆陆续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全面整理中华现代学术成果,深入探寻现代中国的百年学脉。

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 1980 年代末中国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

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地理学、心理学、科学史等众多学科。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录各学科学派的名家名作,展现传统文化的新变,追溯现代文化的根基。丛书立足于精选、精编、精校,冀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更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昭示中华学术与世界学术于思想性和独创性上皆可等量齐观,为中国乃至东方学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应有的地位。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了120岁的生日。为纪念本馆与中华现代学术风雨同行的这段历程,我们整体推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200种),既有益于文化积累,也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诸位学界通人致以感激和敬意。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两个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传承前辈的出版精神,迎接时代的新使命,且行且思,我们责无旁贷。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年11月

凡 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

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目 录

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	1
一、宗部的意义	1
二、宗部与山越的关系	5
三、孙吴的建国	12
四、孙吴的领兵制度	17
五、结论	24
《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	27
西晋田制试释	34
一、曹魏屯田制度的意义及其破坏	34
二、占田与课田的解释	40
三、户调式中的田租问题	50
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	55
一、户调制的起源	55
二、户调与户费的关系	62
三、南朝的布与调	70
四、南朝的折变	76
九品中正制度试释	83
一、九品中正制创立的原因与曹魏政治	83
二、中正的职权、组织及品第	97

三、九品中正制与门阀的配合	118
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	127
一、魏晋北境各族的内迁及其所受待遇	127
二、晋末各族“变乱”的经过	141
三、人口的掠夺和占有	155
四、固有封建势力之保存及其发展	166
五、后论	186
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	191
一、拓跋国家的建立	191
二、草地上的牧人和授田制度下的农民	203
三、隶户、杂户的阶级关系	225
四、结论	240
魏周府兵制度辨疑	246
一、府兵名称的起源	246
二、府兵组织系统之建立	254
三、郎将主府说质疑	261
四、乡兵与乡团	270
五、隋代宿卫制度溯源	275
六、后论	281
清谈与清议	284
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	293
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	306
一、名教之治的动摇	306
二、名理学	315
三、玄学的形成	318

四、由贵无到崇有	326
五、东晋以后的余波	330
六、佛教与名教的关系	334
七、后论	343
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	345
一、《抱朴子·讥惑篇》中所论四事	345
二、魏晋期间江南的学风	355
三、东晋以后南方土著与侨人学风的差异	366
魏晋杂胡考	377
一、屠各	377
二、卢水胡	399
三、羯胡	410
四、乌丸	424
五、乞伏	432
六、稽胡	437
七、后论	442
跋语	448
唐长孺先生和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朱雷 450

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

一、宗部的意义

当汉末黄巾起义之后，长江南部有一种武装组织，称为宗部、宗伍，也被称为宗贼，他们的领袖则称为宗帅。关于这一个“宗”字的意义，《后汉书》卷一〇四《刘表传》：“诏书以表为荆州刺史，江南宗贼大盛”，下面李贤注云：“宗党共为贼”，以后《资治通鉴》卷五九胡三省注也引用了李贤的解释，本来可以不成问题。但清代校勘学者何焯却有一种新的意见。他说：“‘宗’恐与巴賚之‘賚’同义，宗贼疑即蛮贼。”^①照何焯的说法“宗”应该解释为种族名，也即是“賚”之省略或本字。惠栋《后汉书补注》卷一七《刘表传》也引了何焯说，但惠栋却并不赞同，他说：“《吴志》注引《江表传》曰：‘鄱阳民帅别立宗部’，又云：‘海昏县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盖汉末丧乱，人民结聚，劫略郡县……不必皆南蛮贼也。”惠栋驳何说的理由过于简略，下面我们就要详细讨论。我觉得何焯把“宗”

^① 见《义门读书记》、《后汉书》卷三《刘表传》。

说成“賨”可能由于荆州西部恰是賨人所居之地^①。这一点惠栋以鄱阳、海昏之宗部、宗伍来驳正是对的。可是“賨”省作“宗”却极为可能。《宋书》卷六三《沈演之传》称：“二郡强宗侯劭、罗奥聚众作乱。”所谓二郡是指巴西和梓潼，这里有賨人聚居是可以想像的，而罗姓又正是賨族七姓之一^②。同书卷六五《刘道产传》又说“侯揽、罗奥等招引白水氏规欲为乱”，我们知道巴氏往往被称为賨人，所以《宋书》所称之“强宗”很可能是指賨人。

虽然我们可以找到如上的证据来支持何焯的意见，但惠栋之说还是正确的，只是我们还须要加以推论。首先宗部、宗伍在地域分布上不能与賨族符合。所谓賨人不论是板楯蛮或是廩君后裔，他们的分布在后汉末年大概只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可是宗部的活动却在长江下游。除了上引《刘表传》所述荆州江南的宗贼之外，那时以江西的宗部最盛。《三国·吴志》卷四《太史慈传》注引《江表传》：

慈见策曰：“华子鱼良德也，然非筹略才，无他方规，自守而已。又丹阳僮芝自擅庐陵，诈言被诏书为太守。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所遣长吏，言：‘我以别立郡，须汉遣真太守来，当迎之耳。’子鱼不但不能谐庐陵、鄱阳，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

^① 严格说来賨人应只限于巴郡的板楯蛮，他们最早居于宕渠，即今四川的达县、大竹一带。但《晋书》、《魏书》都以廩君后裔为賨人，廩君传说据《后汉书》卷一一六《南蛮传》和《水经·夷水注》乃在今建始、恩施、宜都一带，均在今湖北西部。

^② 见《华阳国志》卷一《巴志》及《后汉书》卷一一六《南蛮传》。

发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鱼亦睹视之而已。”

鄱阳相当于现在的江西鄱阳县，海昏相当于江西建昌县。又《三国·吴志》卷二《孙权传》黄武四年十二月称：“鄱阳贼彭绮自称将军，攻没诸县，众数万人。”而《魏志》卷一四《刘放附孙资传》注引《孙资别传》云：“时吴人彭绮又举义江南，议者以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问资，资曰：‘鄱阳宗人，前后数有举义者，众弱谋浅，旋辄乖散。……’”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彭绮也是“宗帅”，而鄱阳的“宗人”常常要起来反抗孙氏政权，他们可以结聚到数万人之多。

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的宗帅也不少。《三国·吴志》卷一《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吴郡太守陈）瑀阴袭图策，遣都尉万演等密渡江，使持印传三十余纽，贼与丹阳、宣城、涇、陵阳、始安、黟、歙诸险县大帅祖郎、焦已及吴郡乌程严白虎等使为内应。

祖郎等实在也是宗帅。《三国·吴志》卷六《孙辅传》注引《江表传》称：“袁术深怨策，乃阴遣间使赍印绶与丹阳宗帅陵阳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就说祖郎等都是宗帅。又《孙策传》注引孙盛的《异同评》驳书中所云孙策有意袭取许昌的说法，认为其时“深险强宗未尽归复”，孙策不可能作此企图。裴松之又驳孙盛，云“于时强宗骁帅祖郎、严虎之徒禽灭已尽，所余山越，盖何足虑”。孙、裴二人关于孙策是否有袭取许昌的企图意见不同，但都承认阻碍孙策发展的势力是那些“强宗”，裴松之更明确指出祖郎、严白虎都为“强宗骁帅”。由此可见《孙策传》称陈瑀所勾结的险县大帅包括乌程的

严白虎在内都是宗帅,此外《三国·吴志》卷一五《贺齐传》“吴郡余杭民郎稚合宗起,贼复数千人”,自然也是“宗贼”。

甚至在遥远的交州也有这种组织。《三国·吴志》卷四《士燮传》:

戴良为刺史……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发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邻,燮举吏也,叩头谏徽使迎良。徽怒,笞杀邻。邻兄治、子发又合宗兵击徽。

所云宗兵之“宗”,也就是“宗部”、“宗伍”之“宗”。

从上面所引诸条看来,宗部分布的区域异常广泛,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两广及印度支那半岛都有这种组织,参加的人数也非常多。这和賸人的分布状态完全不符,因此将“宗”认作巴賸之“賸”是难以成立的假设。

从《三国志》的纪载中看来,宗部之“宗”只是指宗族而言。上引《太史慈传》所云:“鄱阳民帅,别立宗部”,又说“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部伍是军事组织,所以才“立”,可以“结聚”,宗部、宗伍解释作结聚宗族而成的部伍,我想是比较适当的。《贺齐传》所云“合宗起”,也只能解释为集合宗族起事。至于《孙资别传》所云“鄱阳宗人”,《孙策传》所云“豫章上缭宗民”似乎有利于作种族的解释,但就当时的习惯用语看来,仍然是指宗族或参加这种宗族武装组织的人民。我们知道黄巾起义之后,以宗族乡里的关系而组成的武装集团在北方极其普遍,那末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南方有同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引两个例子来说明宗人的意义。《魏志》卷一一《田畴传》:“畴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余家

居邺”，本传注又引《先贤行状》曹操论田畴功表也说“畴率宗人避难于无终山”。这虽是发生在北方的事，但宗人的解释应该是一致的。又《晋书》卷七六《虞潭传》：“潭遂于本县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这里的宗人显然是指会稽山阴大族虞氏而言，这样的招合大姓起兵，岂非就是结聚作宗伍么？此事虽稍后，但确切地说明了宗人的意义。

因此我认为李贤将“宗”释为“宗党”是正确的。

二、宗部与山越的关系

我们不承认“宗”与“宗党”有什么关系，但我们却可以证明宗部与山越有密切的关系。

从行动上，从地域分布上，我们可以看到宗部与山越几乎难以分别。关于孙吴一代征伐山越的史实及山越的活动区域，近人考证已详，我不想多说，这里只举出一些与宗部有关的例子。

我们已经在上面说到江西鄱阳一带为宗部最盛之地，常常要起来反抗，同时这里却也是山越聚居的区域。《三国·吴志》卷二《孙权传》建安八年：

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还过豫章；使吕范平鄱阳、会稽，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

孙权所攻的是山寇，亦即山越。《吴志》卷一〇《韩当传》称他“还